

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研究

蔡一鸣*

摘要:“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一是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二是赶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如果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当经济霸权国家对非经济霸权国家在这三方面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时,“反超”就可能发生;“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非霸权国家关于“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反超”和“转变”模式,可以解释近代史上的两次更迭,也可为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方向提供一个粗线条的预测。

关键词:经济霸权 霸权国家 经济增长 产权 更迭

一、引言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开始意识到美国曾拥有的经济霸权正在慢慢滑落。冷战结束后,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快速崛起,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又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从而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世界经济中经济霸权问题的激烈讨论。关于哪个国家将成为美国之后的下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或者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如何演变,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国外学者金德尔伯格(2003)预测,“世界将呈现混乱状态”,阿瑞吉和西尔弗(2003)认为新的霸权国家会产生,是谁却悬而未决;高盛公司的Wilson和Purushothaman(2003)则描述了一幅“群雄并起”的太平盛世图:203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六国;沃勒斯坦(2005)预测世界可能向两大强国集团的方向发展:一边是欧洲和俄罗斯,另一边是东亚和美国。国内学者陶大镛(2000)认为“世界走向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理解20世纪中期以来一直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格局,转向正在出现却仍不明朗的新格局的演变?近代史上已经发生的两次演变(英国替代荷兰和美国替代英国)与今天的演变之间存在共同的模式吗?这些都可归结为“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问题。本文把“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关于“反超”问题,笔者构建了一个非线性自治微分方程组所代表的两国模型,分析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在资源、技术和制度三方面相互影响所导致的各种结果,其中,“反超”是结果之一;关于“转变”问题,使用国际产权理论分析一国对外掠夺行为发生的具体过程。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经济霸权相关理论作一个简要回顾和分析;第三部分,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产权理论对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原因给出新的解释;第四部分,使用第三部分的解释模式分析近代史上发生的两次更迭过程;第五部分,根据第三部分的解释模式并结合现实,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作一个粗略的预测;第六部分是全文总结。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

(一)经济霸权的内涵

* 蔡一鸣,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信箱:fenasl@yahoo.com.cn.

一些西方学者对经济霸权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如 Braudel(1977)、Gipin(1981)、金德尔伯格(2003);另一些学者则从整体视角出发,强调霸权的多维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之间的联系,经济霸权只是他们关注的一个侧面,如 Wallerstein(1984)、Modelski(1987)、阿瑞吉和西尔弗(2003)。总体上,尽管西方学者们对经济霸权的界定不尽相同,但基本上都认为经济霸权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一种“地位”或“状态”。因此,拥有这种地位或状态的国家就是经济霸权国家。并且这种“地位”或“状态”与“能力”和“支配”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在西方学者界定的经济霸权内涵中,“能力”和“支配”是他们比较认同的两个重要关键词。前者意味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后文的历史分析中,主要使用人均GDP和GDP作为衡量指标),后者意味着对外的掠夺行为,即经济霸权国家主导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从而掠夺别国资源或财富。根据经济霸权国家掠夺世界其他地区的地理范围,可分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和地区性经济霸权国家。本文中使用的经济霸权概念也包括上述两方面含义。

(二)经济霸权国家的认定

Braudel(1977)、Wallerstein(1984)、Modelski(1987)、金德尔伯格(2003)、阿瑞吉和西尔弗(2003)等学者根据各自的经济霸权定义,对公元1500年以来出现的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做了认定。在他们的研究中,荷兰、英国和美国作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地位,得到一致的认可。但是关于西班牙、葡萄牙是否曾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上述学者存在分歧。诺思和托马斯(1989)关于18世纪前西方世界的论述中,认为西班牙在西欧各国的竞争中失败了。斯塔夫里阿诺斯(1999)和金德尔伯格(2003)也都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经济长期依赖于西北欧各国。因此,尽管葡萄牙和西班牙在16世纪的对外殖民扩张中遥遥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两国由于没有取得对欧洲其他国家经济的支配性力量,并不是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结合麦迪森(2003)和斯密(2005)等学者关于荷兰、英国和美国在历史中的经济表现,本文认为,三国享有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头衔的时间分别为:荷兰为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为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美国为20世纪中期以来。

(三)经济霸权国家更迭的原因

西方学者此方面的理论可分为单因素决定论和多因素决定论。在单因素决定论中,Gipin(1981)用经济霸权国家对外扩张中的报酬递减规律解释霸权国家的衰落。Olson(1982)从一国利益集团的发达程度与其经济活力的相关性这一视角,试图揭示影响国家兴衰的内在动因。Modelski(1987)强调全球性战争是霸权国家更迭的原因。Kennedy等(1989)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在军备(对外扩张)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资源分配。Acemoglu等(2002)在批评地理决定论的基础上,强调外生的制度变迁决定一国的经济表现。阿瑞吉等(2003)从企业竞争的角度解释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机制。Artige等(2003)认为大国的兴衰取决于其在消费和知识投资之间的资源分配。Gorski(2004)认为新教改革是荷兰的经济霸权产生并随后向英国转移的原因。Freeman(2005)强调科学技术对于一国在全球经济中取得领导地位的重要作用。在多因素决定论中,Wallerstein(1984)把专业技术知识的传播和国内工人阶级及骨干的实际收入上升两个方面视为经济霸权国家衰落的根源。金德尔伯格(2003)认为经济霸权国家衰落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很多外部原因和内部原因,如战争、过度扩张、抵制税收、创新能力低下等。

上述更迭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较少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如一些理论侧重于政治、军事甚至宗教视角;第二,只能解释历史中的一次更迭过程或者具有片面性,如Gorski(2004)的理论只能解释经济霸权从荷兰向英国的转移,阿瑞吉等(2003)用企业兴衰解释霸权国家之兴衰,然而不同形式的企业各有优势劣势,谁代替谁似乎并不是必然的;第三,一些理论主要关注经济霸权国家本身,忽略了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联系对“更迭”的影响。本文试图突破上述局限,从一般均衡的视角对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问题寻找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模式。

三、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理论分析

与经济霸权的内涵相对应,“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西方学者们主要关注“反超”问题,而把“转变”视为自然的结果。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增长理论和国际产权理论,分别对“反超”和“转变”两个子问题进行解释。

(一)“反超”

“反超”问题很明显涉及到经济增长理论。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经济增长的源泉依然没有形成结论性的共识,于是,前文所述的国内利益集团、企业竞争、制度、消费、技术等等都被用来解释一国经济的兴衰。尽管如此,经济学界还是出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资源、技术和制度这三类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给予尽管模糊却越来越多的强调(Nelson, 1996; Barro, 1997; Helpman, 2004)。诺思(1994a)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如下静态解释:资源的数量取决于技术水平,一定技术水平决定一个社会的最大潜在产量,而制度则决定了这种潜在产量转变为现实产量的程度。下面,先分析资源、技术和制度各自的经济学内涵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解释“反超”的两国模型。

1. 资源、技术、制度与经济增长

(1)资源。资源总体上可分为三大类:劳动力,包括其数量和质量;自然资源,包括矿藏、森林等;资本资源,包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如基础设施等。从根源上,资本资源也是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为投入的一类产出。两千多年以来,在世界人口总体上持续增长的一般趋势下,世界经济总体上也在持续增长(麦迪森, 2003),这表明人类变得越来越富裕(当然是从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视角),比其祖辈享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产品。这些产品直接依赖于生产时耗费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数量。因此,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直接投入,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柯武刚、史漫飞, 2004)。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潜在)资源数量指,由当时世界最高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可以被利用的资源存量。但有多少资源实际进入生产过程,还取决于该国的实际技术水平和制度水平。因此,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如下关系:一定技术和制度水平下,潜在资源数量越多,从而实际可以进入生产过程的投入也越多,最终产量越高。

(2)技术。技术一词源于古希腊语,原意指“人对自然的关系”。技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技术包括生产技术和非生产技术。狭义的技术仅指生产技术,即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或人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在经济学中,技术指将投入转化为产品的方法,与生产函数联系在一起,后者反映物质上既定投入与最大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技术与生产函数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决定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种类,从而决定一个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总量;二是技术决定生产函数中投入产出之间的数量关系,分为两种情况:技术进步不改变投入要素比例和改变投入要素比例,后者意味着某一类投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提高更快,从而节约了另一类投入要素。因此,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通过发现更多可以进入生产函数的资源,增加整个社会的总投入量从而增加产量;改进现有投入产出关系,节约现有资源从而增加产量。因此,从生产函数的角度,技术决定了既定资源存量下的潜在最大产出。而现实中,最大产出的实现受到三个方面的约束:交通、通讯技术和制度(见后文详述)。交通技术对生产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若某生产过程需要投入要素A、B,而它们却不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它们各自所在地之间的交通状况就决定了它们能否“在生产函数中相遇”,从而决定了生产的现实性。若没有15、16世纪航海技术的进步,非洲的黑人不可能与美洲的自然资源进入“西欧殖民者先进的生产函数”。而通讯技术对于生产函数的作用而言,就是加快这种客观可能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因此,对于一个国家、地区或全世界而言,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以更快地进入生产领域并减少耗费在交通中的资源。

(3)制度。很多学者对制度给出了不同的界定。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诺思(1994b)的定义: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是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与技术的原意对应,制度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活动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分为生产活动和交易活动。因此,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其总产量函数应包括上述两种活动。生产函数反映了一定技术水平下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客观可能性,如前文所言,这种客观可能性除了受到交通、通讯技术的影响之外,还受到规范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制度的影响。因为在生产要素被配置到生产环节之前或者这种投入产出关系实现之前,产权因素和交易成本因素往往阻碍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产权关系到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一方面,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换,因此产权的界定是否清晰决定了交易能否发生及其发生的困难程度,这无疑会影响交易主体进行交易活动的动力,极端情况下导致没有生产要素进入生产领域;另一方面,若产权保护不力,也即经济主体预期其交易和生产所得得不到保护,就不会将外部性内在化,也即最终没有生产活动发生。交易成本是与产权的转让和保护相关的成本(Barzel, 1988)。因此,交易成本与产权关系密切,从而也关系到“内在动力”。但另一方面,交易成本也间接地反映了市场的竞争程度,所以它还关系到经济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外在压力。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交易的可能性,是否有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以及什么样的要素进入。如果交易成本越小,进入市场的要素越多,从而竞争越充分,结果经济主体在外在竞争压力下选择最有效率的要

素投入生产领域。以上这两类因素就是经济制度涉及的主要内容。通过产权界定和保护并降低交易成本,可以使更多更有效率的要素进入生产领域,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实现既定技术水平下的潜在产出。

(4)开放经济中的资源、技术和制度。开放经济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的结果之一就是,各国的资源、技术和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经常性的外生冲击。具体而言,一国资源可能因为国际掠夺或被掠夺而增加或减少,技术和制度可能因为国际外溢而发生变迁。技术和制度的国际外溢由其非竞争性特点决定。因此在开放经济中,一国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提高该国的潜在最大产出能力即经济增长的上限,也可以通过制度引进增加潜在最大产出的实现程度。但是,对于封闭经济体而言,资源虽然不会受到国外因素的影响,但其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只能依靠内部的缓慢演进。19世纪末以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内陆地区,在技术和制度上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所处的落后水平,就是封闭经济中技术和制度缓慢演进的一个最好例证。

2 关于“反超”的一个两国模型

(1)假设。假设 1: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假设 2:世界经济中有两个国家,即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并且,经济霸权国家的制度和技术水平更高,经济实力更强。假设 3:在技术和制度两方面,经济霸权国家通过技术和制度扩散对非经济霸权国家产生“正”的影响;在资源方面则对非经济霸权国家产生“负”的影响(因为前者对后者的掠夺)。并且这两种影响的大小都与两国相对经济实力成正比。

(2)模型。根据假设 1 和 2,一国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因此,从一般均衡的视角,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也通过这三条途径进行。为了更清晰地观察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相互联系后的各种结果,可以把假设 3 中两国的互动模式表示为如下动力系统:

$$\frac{dq^*}{dt} = r_1 \left(1 + \alpha_1 \frac{q^*}{q} \right) q^*, \quad \alpha_1 > 0, \quad q^*, q > 0 \quad (1)$$

$$\frac{dq}{dt} = r_2 \left[1 + (\alpha_2 - \alpha_3) \frac{q^*}{q} \right] q, \quad \alpha_2, \alpha_3 > 0 \quad (2)$$

其中, q^* 和 q 分别代表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 q^*/q 代表两国相对经济实力。经济霸权国家和非经济霸权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r_1 和 r_2 。(1)式中的因子 $\alpha_1 q^*/q$ 体现了霸权国家的国际掠夺对自身经济增长的影响,该影响与两国经济相对实力成正比,其中 α_1 为比例系数;(2)式中的 $(\alpha_2 - \alpha_3) q^*/q$ 体现了霸权国家的掠夺和技术与制度的扩散对非霸权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的“净”影响,该影响也与两国经济相对实力成比例。其中,技术与制度扩散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alpha_2 q^*/q$, 掠夺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为 $-\alpha_3 q^*/q$, α_2 和 $-\alpha_3$ 为比例系数。因此,动力方程 (1) 和 (2) 分别描述了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经济实力的变化轨迹。

(3)模型的平衡点及定性分析。两国模型为非线性自治微分方程组,本文构建两国模型的目的只是为了揭示两国经济实力在上述假设条件之下的变化特点。因此,这里只解出模型的平衡点,并运用相图进行定性分析。根据模型解如下方程组:

$$r_1 \left(1 + \alpha_1 \frac{q^*}{q} \right) q^* = 0 \quad (3)$$

$$r_2 \left[1 + (\alpha_2 - \alpha_3) \frac{q^*}{q} \right] q = 0 \quad (4)$$

记 $\alpha_4 = (\alpha_2 - \alpha_3)$, 得到平衡点为: $p_1(0, 0)$, $p_2(q^*, -\alpha_1 q^*)$, 当且仅当 $\alpha_1 = \alpha_4$ 。

令 $\frac{dq^*}{dt} = 0$, 得到 q^* 曲线 $\dot{q}^* = 0$ (见图 1): $q = -\alpha_1 q^*$ (5)

令 $\frac{dq}{dt} = 0$, 得到曲线 $\dot{q} = 0$ (见图 1): $q = -\alpha_4 q^*$ (6)

根据 α_1 、 α_4 的不同取值,曲线 $\dot{q}^* = 0$ 和 $\dot{q} = 0$ 在相图平面上有多种不同的位置。本文只考虑其中两种情况(对于本文的目的,已经足够了)。

第一种情况,当 $\alpha_1 > 0$, $\alpha_4 > 0$ 且 $\alpha_4 > \alpha_1$ 时,可得到相图见图 1-1。图 1-1 中的虚线箭头表示 q, q^* 的可能运动方向。 $q = q^*$ 为过原点的 45 度直线。对于位于直线 $q = q^*$ 以下的任意一点如 A, 即 $q^* > q$ 的初始点,图 1-1 中虚线箭头方向除了说明平衡点 $p_1(0, 0)$ 不稳定之外,还意味着 q 和 q^* 的变化趋势可能出现两种情

况:其一, q, q^* 随时间向右上方运动且越过 $q = q^*$ 曲线, 从而出现 $q^* < q$ 的结果, 即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被非霸权国家超过; 其二, 向右上方运动却不越过 $q = q^*$ 曲线, 即两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而不发生“反超”。

第二种情况, 当 $\lambda_1 > 0, \lambda_4 > 0$ 且 $\lambda_4 = \lambda_1$ 时, 可得到相图如图 1-2。图 1-2 中的平衡点 $p_2 (q^*, -\lambda_1 q^*)$ 也不稳定。并且, 对于 $q^* > q$ 的初始点如 B, 其可能的运动方向中, 也包括了反超和未反超两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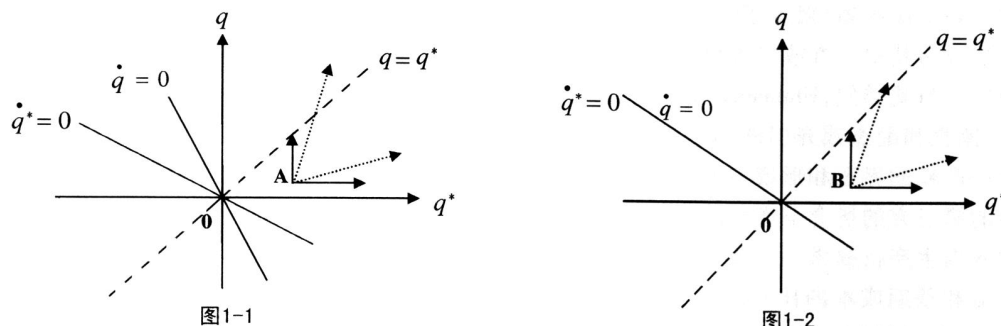


图 1 两国经济实力变化方向

(4)模型的数值解及其经济解释。对模型中的参数设定不同的初始值 (见表 1), 可以得到两种有代表性的数值解 (见图 2, 用 Matlab7.0 求解得到)。根据两国模型, 两国经济实力的相互影响取决于 $q^*/q, \lambda_1$ 和 $(\lambda_2 - \lambda_3)$ 。其中, λ_1, λ_2 和 λ_3 三个外生变量的取值又会影响到 q^*/q 的变化。为了单独考察 $(\lambda_2 - \lambda_3)$ 的不同取值对两国相对经济实力 q^*/q 的影响, 表 1 中的其他变量取相同值。

表 1 两国模型的两组代表性初始值及其结果

	x_0	y_0	λ_1	λ_2	λ_3	$\lambda_4 = (\lambda_2 - \lambda_3)$	结果
第 1 组	10	5	0.05	0.02	1	1	差距拉大
第 2 组	10	5	0.05	0.02	1	6	实力反超

说明: 表 1 中 x_0 和 y_0 分别代表 q^* 和 q 的初始值。另外, 在两组初始值中霸权国家的自然增长率都大于非霸权国家, 这样处理只是为了分析的简便, 因为在上面的相图分析中, 反超和未反超两种情况的出现, 都不需要约束两国自然增长率的大小。

第一组参数值中 $(\lambda_2 - \lambda_3)$ 较小 (相对于第二组), 表明经济霸权国家对非霸权国家的净影响为“正”却较小, 最终两国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拉大了 (见图 2-1); 第二组参数中, $(\lambda_2 - \lambda_3) = 6$, 非霸权国家受到的净影响较大, 结果经济实力出现“反超” (见图 2-2)。因此, 可以对两国模型的经济含义做出如下解释: 在经济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的经济联系中, 一方面, 霸权国通过资源掠夺对非霸权国造成“负”的影响; 另一方面, 霸权国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扩散对非霸权国造成“正”的影响。对非霸权国家而言, 若净影响为“正”且较大, 则该国经济实力就可能超过霸权国而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领头羊; 若净影响为“正”却较小, 其经济发展就缓慢, 最终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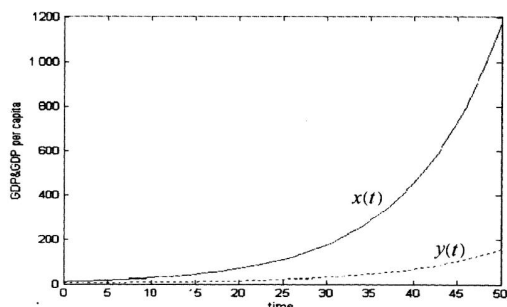


图2-1(差距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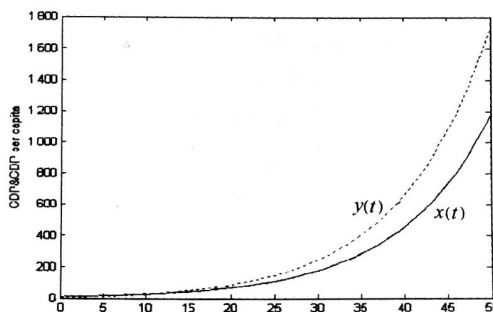


图2-2(实力反超)

说明: 图中横坐标为抽象的时间单位; 本文同时选用 GDP 和人均 GDP 两个指标来代表经济实力, 因此纵坐标为“GDP 或人均 GDP”; $x(t)$ 和 $y(t)$ 分别为 q^* 和 q 的变化轨迹。

图 2 两种代表性数值解的图形

理论上也存在“净影响为负”的情况。如果净影响为负, 其他条件不变时, 两国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二)“转变”

根据经济霸权的内涵,“转变”意味着一国对外掠夺行为的发生。近代史上,经济霸权国家掠夺非霸权国家资源(财富)的手段或者是以武力为后盾的直接掠夺,或者是垄断贸易,或者是国际铸币税。不管经济霸权国家以何种方式掠夺非霸权国家,“转变”意味着国际产权结构的调整。已有的关于产权界定和形成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其一,以 Eavns - Pritchard (1937)和 Gluckman (1956)为代表的产权内生论。Eavns - Pritchard (1937)和 Gluckman (1956)揭示了产权可以内生,即产权的界定和形成只由与产权相关的当事人决定,产权的形成可能是因为其中一方或多方倚仗了武力或武力威慑,也可能是当事人受制于某种价值体系、意识形态或习俗的结果。与此类似,Umbeck (1981)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强力创造产权”的观点。其二,以菲吕博腾和配杰威齐(1994)、诺思(1994a)为代表人物的产权外生论,强调国家或者其他具有强制力的第三方在产权的界定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转变”问题涉及到在缺乏有效的世界政府且没有作为最终权力来源的第三方的场合下产权的国际分配(Eggertsson, 1990)。进一步地,Demsetz (1967)的理论可以为国际关系中的内生产权提供一个简单的经济学解释,即“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一国“关于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很明显,若掠夺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转变”就会发生。因此,一国向经济霸权国家的转变,只是作为“理性人”的国家,关于“预期的掠夺成本与收益比较结果”的一种自然反应。

在一国决定“转变”后,由于国内和国外各种因素的阻碍,“转变”往往存在时滞。Davis和 North (1971)曾对新制度安排过程中“从对潜在利润的认识到新制度安排的创新之间的时滞”做过深入研究。他们认为,导致新制度安排时滞的因素大致包括三类:其一,从辨识外部利润到组织初次行动团体所需的时间;其二,发明将外部利润内在化的方法并从中选出最优方法所需要的时间;其三,启动时滞。对于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而言,启动时滞还特别取决于来自国内和国外对立政治联盟的力量。很明显,“转变”是由一国政府主导的行为,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属于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安排。所以,对于谋求世界经济霸权的国家而言,尤其要考虑启动时滞,因为该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掠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国内外的抵制。

四、近代史上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两次更迭

荷兰是近代史上第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随后,荷兰被英国取代,后者又被美国取代。这里使用前文的“反超”和“转变”模式具体分析这两次更迭过程。

(一)第一次更迭:英国替代荷兰

17世纪的英国经济学家和外交官们都视荷兰为可以学习的经济楷模。“任何仔细的观察家对荷兰现状的观察都不及英国人”(沃勒斯坦,1998)。英国人不仅是优秀的观察家,也是“荷兰的好学生”(Marshall, 1920)。“随着市场的扩大,英国人采用类似荷兰人那样的商业、工业和农业创新。私有产权的建立和贸易与商业中交易费用的降低,使英国在17世纪逃脱了使法国和西班牙深受其害的马尔萨斯灾难”(诺思,1994a)。

造船技术和农业中的集约化耕作方法是英国从荷兰学到的最重要的技术。前者为英国的海上扩张提供了客观前提,后者为英国成功逃脱马尔萨斯灾难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造船业在近代早期,是荷兰的第一大产业也是整个欧洲的第二大产业,荷兰的造船技术一直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模仿的对象。特别是在1688年荷兰总督威廉就任英国国王之后,鼓励荷兰熟练工人去英国工作从而加速了造船技术向英国的扩散。到1780年,英国商船队的运载量已经远远地超出荷兰并为后者的两倍多(麦迪森,2003)。农业中,通过集约化耕作可以充分利用土地,这是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提高的关键。将饲草如三叶草等引入多年轮作制,用劳动力代替空间并且在非游牧状态中发展了高生产率的畜牧业。由于这种技术的引进,英国和荷兰一起成为欧洲农业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巴斯、韦直宁根,2002)。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就是沿着荷兰的方向进行的,并且,这些改革随着1688年来自荷兰的新国王的就任得到进一步巩固,因为他同时也是荷兰的总督”(麦迪森,2003)。英国在制度方面的学习,集中体现在为保护私有产权而进行的“光荣革命”和圈地运动两个方面。另外,1694年英格兰银行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在伦敦成立,这个以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为模仿原型的机构,朝着中央银行的方向又迈出了一大步。

在17世纪的欧洲,荷兰倚仗其强大武力垄断了波罗的海、地中海以及西欧南北之间的大部分贸易。作

为荷兰经济霸权体系中的国家,英国无疑也成为荷兰垄断贸易的受害者,但同时作为荷兰霸权体系下的强国,英国所受到的掠夺明显小于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随着17世纪中后期英国和法国一系列航海条例的出台和实施,荷兰的垄断贸易开始下降,从而英国作为受害国受到的掠夺也逐渐减少。

总体上,荷兰对英国的资源掠夺是轻微的,即 β_3 较小;而另一方面,英国却成为荷兰先进技术和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即 β_2 较大,从而英国受到的净影响为正且较大。荷兰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与英国更丰富的资源结合到一起的结果就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某个时期,英国的人均GDP和GDP均超过荷兰(克拉潘,1980;麦迪森,2003)。在17、18世纪,以邻为壑的重商主义统治着整个欧洲。“对外殖民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的观念,驱使着欧洲各殖民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掠夺。早在17世纪,英国在亚洲、非洲和北美洲就开始进行殖民活动。到18世纪末,经济实力反超荷兰后,重商主义在英国的对外政策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也就在这一时期,英国完成了向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的“转变”:在非洲,垄断与其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在亚洲,主要通过设立在印度的垄断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进行掠夺;在美洲,它是加拿大和美国独立前十三个殖民地的宗主国,并且在加勒比殖民地开发制糖业;在欧洲,掠夺荷兰、法国和西班牙等国的海外殖民地。另外,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英国还倚仗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从全世界各地获取金本位制下的英镑国际铸币税。

(二)第二次更迭:美国替代英国

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时期,美国一直是英国先进技术的受益者,并且也是英国工业革命向海外传播的最大受益国。可以说,美国的工业革命史,就是一部技术输入史。殖民地时期,英国移民从国内带来斧子、铲子、手耙、铁锤及其他工具,基本上使用与国内相同的技术设备。并且,不久就建立了锯木厂、铁匠炉、砖窑、造船设备等等,大批日用产品如玻璃、胶水、蜡烛、布匹、染料、生铁以及许多其他物品被制造出来。美国独立后,英国的纺织和炼铁两大类技术大规模地扩散到国内。特别是,铁路技术、蒸汽机、炼铁技术、炼钢技术、机器制造等从英国引进后大规模地用于工业应用。到1870年,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十年后,其制造业居世界第二位。此外,美国从英国引进的技术还包括农业生产中的轮作制、种牛技术等等(冈德森,1994)。

北美大陆殖民地人民关于所有制、企业管理、商业经营等方面的观念都是以英国经验为基础的,大多数移民都坚持认为财产权利的个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冈德森,1994)。美国独立后,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和一个人口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国家,其制度不可避免地与英国有着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如政治上的议会制政体以及经济方面的许多法规——破产法、有关专利和版权方面的条例和工厂制度等等。特别是1787年新宪法诞生,美国从邦联制转向联邦制,标志着一个更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出现。在邦联制时期邦政府不能收税,其开支只能靠借款及发行货币予以解决。根据新宪法,联邦政府被明确地赋予征税权,并依照英国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公共财政体系。

一方面,美国受益于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制度“遗传”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另一方面,独立后被英国掠夺英镑国际铸币税的程度由于金本位制度的限制肯定不会很严重(福特,2002)。因此,从两国模型的角度,由于 β_3 较小而 β_2 较大,拥有更丰富资源的美国“反超”英国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人均GDP和GDP总量均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麦迪森,2003)。至今,美国在经济实力上仍然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在反超英国并成为近代史上第三位世界经济领头羊后,美国国内曾几度盛行的“孤立主义”,质疑“对外掠夺的收益大于成本”的重商主义传统观念,成为美国向世界经济霸权国家“转变”的重要阻因。直到20世纪中期,也就是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滞”后,孤立主义在美国式微,美国终于从世界经济领头羊“转变”成世界经济霸权国家。与荷兰和英国相比,美国掠夺世界其他国家资源的方式更加隐蔽——攫取美元国际铸币税。

五、关于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一个粗线条预测

大量的实证研究(钱纳里等,1989;世界银行,1991;Maddison,1995)表明,20世纪以后技术、制度在经济

17世纪的英国实质上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经济霸权国家。

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再如 20 世纪以前那样显著。因此,根据两国模型,20 世纪以后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变得更有利于后者,并倾向于缩小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同时,由于技术和制度具有非竞争性,意味着当前世界经济中的众多资源大国都可能通过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在经济实力方面赶上甚至超过美国。目前,无论是从人均 GDP 还是 GDP 的角度,美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正在下降。而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如何演变?本部分试图使用两国模型对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做一个粗线条的预测。

(一)美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一个计量视角

作为第三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美国的先进技术和制度向世界其他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扩散,很多国家和地区由于分享这些先进技术和制度而获得了经济上的快速增长。但另一方面,作为美元国际铸币税的获得者,美国一直在掠夺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源。20 世纪以后,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升,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相互联系应该更有利于后者,那么经验数据是否为这种交互关系提供支持呢?

1. 数据说明及计量方法

根据两国模型,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相互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对美国经济的经济增长率与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定量分析美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处,选取美国(MZ)、西欧(XZ)、亚洲(YZ)、非洲(FZ)和拉美(LZ)5个经济体,考察其增长率之间的联系。数据来源于麦迪森(2003)编制的跨国数据库,样本区间为1951-1998年(5个经济体的增长率见图3)。统计软件采用 Eviews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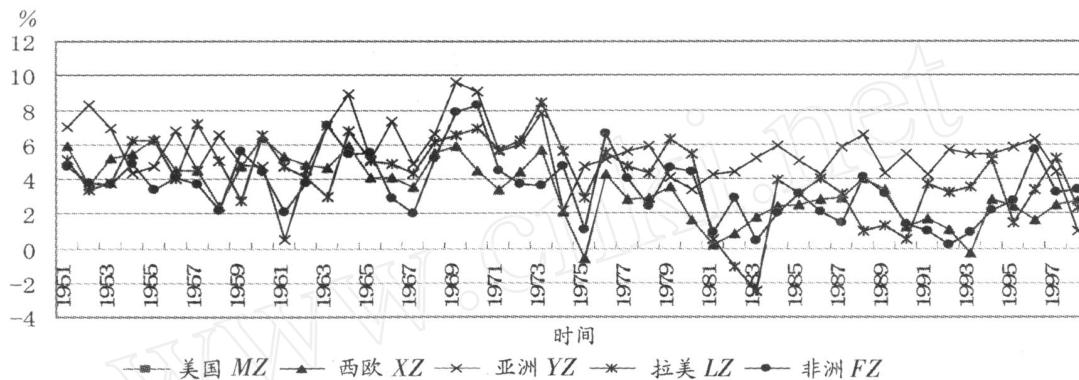


图 3 5 个经济体的 GDP 增长率 (1951 - 1998 年)

2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在样本区间内,5个经济体的增长率数据都为平稳序列。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显示,在10%的显著水平上,美国经济的增长率分别是其他4个经济体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其他4个经济体的增长率都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表 2 5 个经济体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原假设	F 统计量	伴随概率	结论
XZ 不是 MZ 的格兰杰原因	0.4729	0.7029	接受
MZ 不是 XZ 的格兰杰原因	3.2109	0.0336	拒绝
YZ 不是 MZ 的格兰杰原因	0.0006	0.9802	接受
MZ 不是 YZ 的格兰杰原因	3.6886	0.0613	拒绝
FZ 不是 MZ 的格兰杰原因	0.5999	0.6190	接受
MZ 不是 FZ 的格兰杰原因	2.8995	0.0474	拒绝
LZ 不是 MZ 的格兰杰原因	0.3732	0.5444	接受
MZ 不是 LZ 的格兰杰原因	4.0859	0.0494	拒绝

3. 对检验结果的解释——基于两国模型的视角

20 世纪以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小,而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升,即相对于 20 世纪以

20 世纪以前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源,霸权国家与非霸权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更有利于前者。因此,取代原霸权国的国家的资源必须远大于被取代者。如英国的资源远多于荷兰,美国的资源也远多于英国。

前,两国模型中的 β_1 变小且 $(\beta_2 - \beta_3)$ 变大。进一步地,当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经济出现增长即 q^* 增加从而 q^*/q 变大,结合 $(\beta_2 - \beta_3)$ 的变化(20世纪以后较大), (2)式所代表的非霸权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当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出现增长即 q 增加从而 q^*/q 变小,结合 β_1 的变化(20世纪以后较小), (1)式所代表的霸权国家经济增长趋近于封闭经济时的速度。也就是说,20世纪以后由于技术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变大,并且美国向世界其他地区一直在传播技术和制度,导致其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却对美国只有较小的影响。于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成为其他所有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都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因此,经验数据表明了世界其他地区从与美国的相互联系中的确获利更多,从而意味着世界其他地区追赶上美国是可能的。

(二)未来的多极化世界

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日本和德国两国体现得最为明显。从人口和国土面积的角度,日本和德国相对于美国属于资源小国。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数据,日本的人口数量不到美国的1/2,国土面积仅为美国的1/30,GDP却占美国的33%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德国的国土面积略小于日本,人口则更少,而其GDP约为美国的22%居世界第三位。作为最大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四国尽管在技术和制度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还较大,但它们所拥有的资源如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数量庞大,远多于日本和德国,与美国相差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要超过美国。这些国家近年来一直积极引进技术和制度,经济增长的平均速度都快于美国(见表3)。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两国模型可以得到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粗略预测:多极化——即在未来世界经济中,不再存在某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对其他所有国家拥有绝对优势,而是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经济实力相差不大的大国呈鼎足之势。

表3 美、日、中等7国的经济概况(1973-2006年)

国家	2006年人口(千万)	国土面积(万平方公里)	1973-1998年增长率(%)	1999-2006年增长率(%)
美国	300	936	2.99	2.6
日本	127	38	2.97	1.7
德国	82	36	1.76	1.03
中国	1.315	960	6.84	9.3
巴西	188	855	3.4	2.6
印度	1.095	328	5.07	6.2
俄罗斯	143	1.707	-5.6	6.8

注:1973-1998年的数据来自麦迪森(2003);1999-2006年的数据来自World Bank数据库(<http://www.worldbank.org>)。

六、总结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意识到美国拥有的经济霸权正在滑落。下一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是谁?学术界争论不休。西方学者们关于经济霸权的内涵、经济霸权国家的认定以及经济霸权国家更迭原因方面的理论成果非常丰富。综合这些理论,本文认为“经济霸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强大的经济实力,二是对外的掠夺行为。并且,自公元1500年以来,历史上出现过三个世界经济霸权国家:17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荷兰、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的英国和20世纪中期以来的美国。“经济霸权国家的更迭”可以分解为两个子问题:其一,非经济霸权国家的经济实力如何“反超”经济霸权国家;其二,反超后,原来的非经济霸权国家为何以及如何“转变”为新的经济霸权国家。以“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源、技术和制度”为重要假设前提,本文构建了两国模型,其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在经济霸权国家和非霸权国家的经济联系中,一方面,霸权国家通过资源掠夺对非霸权国家造成“负”的影响;另一方面,霸权国家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扩散对非霸权国家造成“正”的影响。对非霸权国家而言,若净影响为“正”且较大,则该国经济实力就可能“反超”霸权国家而成为新的世界经济领头羊;若净影响为“正”却较小或者为“负”,将导致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拉大。“转变”的发生与否取决于该国关于将外部性内在化的预期收益和预期成本的比较结果。历史上英国对荷兰的替代和美国对英国的替代,都可以从“反超”和“转变”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以当前世界经济中各大国的发展现状为基础,结合技术与制度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及其

(2)式两边同时除以 q ,即为非霸权国家的经济增长率。

非竞争性,根据两国模型可以对未来世界经济格局作一个粗线条的预测——“多极化”。

参考文献:

1. 阿瑞吉、巴尔、久枝秀次:《商业企业的转型》,见阿瑞吉、西尔弗 编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中文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阿瑞吉、西尔弗 编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乱与治理》,中文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3. 巴斯、韦直宁根:《生命革命中的农业》,见波斯坦、科尔曼、马赛厄斯 等编著:《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5 卷),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 菲吕博腾、配杰威齐:《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见科斯、阿尔钦、诺斯 等编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 福特:《国际金融政策和金本位:1870 - 1914》,见马赛厄斯、波拉德 等编著:《剑桥欧洲经济史》(第 8 卷),中文版,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6. 冈德森:《美国经济史新编》,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7. 金德尔伯格:《世界经济霸权》,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 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中文版,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9. 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中文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10. 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文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 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12.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a。
13.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b。
14. 钱纳里 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中文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15.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文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6.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文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
17.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文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8. 陶大镛:《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9.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 2 卷),中文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20. 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结构危机与世界的未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4)。
21. Acemoglu, D.; Johnson, S. and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7(4), pp. 1231 - 1294.
22. Artige, L.; Camacho, C. and Croix, D. D., 2004. "Wealth Begets Decline: Reversals of Leadership and Consumption Habit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Vol 9(4), pp. 423 - 449.
23. Barro, R. J., 1997. 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 - country Empirical Study. Cambridge, MA: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pp. 2 - 5.
24. Barzel, Y., 1988.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perty Righ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2 - 20.
25. Braudel, F., 1977. 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Life and Capitalism. Maryland: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p. 80 - 86.
26. Davis, E. and North, D., 1971.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31.
27. Demsetz, H., 1967. "Towards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5), pp. 347 - 359.
28. Eavns - Pritchard, E., 1937. Witchcraft, Oracle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of the Anglo - Egyptian Sud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p. 28 - 100.
29. Eggertsson, T., 1990. Economic Behavior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78 - 190.
30. Freeman, R. B., 2005. "Does Globalization of the Scientific/Engineering Workforce Threaten U. S Economic Leadership." NBER Working Paper, No. 11457.
31. Gilpin, R.,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 160.
32. Gluckman, M., 1956. Custom and Conflict in Africa.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 56 - 68.
33. Gorski, P., 2004. "The Protestant Reformation and Economic Hegemony: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Holland and Eng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aper 13.
34. Helpman, E., 2004. The Mystery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3 - 20.
35. Kennedy, P., 1989.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pp. 502 - 522.
36. Maddison, A., 1995.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 - 1992" OECD Development Centre, pp. 167 - 170.
37. Marshall, A., 1920. Industry and Trade: A Study of Industrial Technique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of Their Influence on Various Classes and Nat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p. 167.
38. Modelski, G., 1987.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p. 40.
39. Nelson, R. R., 1996.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p. 2 - 12.
40. Olson, M., 1982.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Economic Growth, Stagflation and Social Rigid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5 - 17.
41. Umbeck, J., 1981. "Might Makes Rights: A Theory of the Formation and Initial Distrib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Economic Inquiry, No. 2, pp. 38 - 59.
42. Wallerstein, I.,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 - 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2 - 46.
43. Wilson, D. and Purushothaman, R., 2003. "Dreaming with BRICs: the Path to 2050." Goldman Sachs: Global Economics Papers, No. 991.

(责任编辑:刑宏洋)